

“一带一路”的“三缘”政治分析^①

胡 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来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包括“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计划”“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中国过剩产能向外转移的战略”等等。但是,“一带一路”的实质是互联互通:内部与外部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文化上的互联互通,最终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资金流、货物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的经济新格局。这样一个全新的经济性格局,将会带来欧亚大陆从竞争性博弈向合作性博弈的地缘政治、天缘政治和人缘政治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最大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天缘政治;人缘政治;互联互通;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4-0041-06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后,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少争论,如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计划”“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中国过剩产能向外转移的战略”等等^[1]。但是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实质上就是互联互通。首先,它是内部与外部的互联互通。中国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主要还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向海洋的开放,引进外资也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资本。陆上与邻国的开放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对陆上邻国的开放程度并不太高。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所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就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尤其是要实行海陆并重的对外开放^[2]。其次,“一带一路”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落后,原因就在于交通不发达,因而资源无法产生市场效应。所以,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要互联互通,而且国内与相邻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实行互联互通。再次,“一带一路”是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

早、市场发育早,所以市场体制机制比较成熟,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体制机制受封闭经济的影响而相对落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或多或少存在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加快市场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就是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最后,“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上的互联互通。沿线地区都是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交汇处,需要通过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互信。最终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资金流、货物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的经济新格局。构建这样一个经济新格局,必然涉及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信息流通和人才培养问题,也就是地缘政治、天缘政治和人缘政治三大问题。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

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所阐述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是一个竞争性的地缘政治态势。在该书中,布热津斯基认为“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政治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3]由此可见,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欧亚大陆完全是一个竞争性的地缘政治格局。而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的确扮演了地缘竞争的战略棋手的角色,并引发了欧

^①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法学高原学科(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方向)的支持。

收稿日期:2016-01-24

作者简介:胡键(1968—),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大国关系与中国战略研究。

亚大陆内部一系列的战争和冲突,从“沙漠之狐”行动到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俄格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政治冲突。然而,这些战争和冲突在重塑欧亚大陆秩序方面是完全失败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用战争和政治冲突等传统地缘政治手段来塑造国际秩序已经与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时代完全相悖。正因为如此,中国试图开辟蹊径,并基于国际社会共生的现实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塑造欧亚大陆秩序。^①既然是基于国际社会共生的现实,那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塑造一个合作共赢的欧亚新棋局。

第一,中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一直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发展;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中国从来不追求主导权,而是坚持各成员国完全平等。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共赢的原则来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在外交原则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为了追求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也不是要挑起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竞争。而事实上,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后,欧亚大陆各国都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兴趣并表示会从本国的战略考虑来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②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之下,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将朝着多赢合作的新格局发展。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欧亚大陆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大计。地缘政治竞争总是与地缘经济竞争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地缘政治走向合作共赢,那么地缘经济也将是合作共赢的格局。这是因为,“一带一路”的实质内容就是互联互通,而为了实现互联互通,一方面,中国用实际行动推进了欧亚大陆的市场对接,即通过“一带一路”的各种项目和合作框架,实现了沿线各国的市场对接,最终将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此之前,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虽然步履艰难,但在双边项目和多边项目的共同推进下,中亚地区的市场对接不断加强。尤其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将更进一步提高欧亚地区市场的融合程度。在东盟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较早地启动了自贸区谈判,现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正式启动。这就意味着,“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市场对接已经基本上实现并正在进一步推进,统一大市场已初见端倪。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还将进

一步促进沿线各国利益的相互嵌入。市场开放也就意味着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市场的相互依赖无疑是以利益为前提的,特别是在具体项目的支撑下沿线国家的利益相互嵌入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通过市场开放引进大量外资,同时中国在“走出去”方面也有不少举措,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互嵌入已经非常深。“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战略意义上的相互嵌入,并形成各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契合^[1]。

第三,“一带一路”也强调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无疑,“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但其目标绝非仅仅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各种文化、宗教荟萃之地,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有诸多禁忌,单纯用经济项目来推动各国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历史上,外来文化、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本土宗教之间因触碰对方的禁忌而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再附上意识形态的因素,那么这就真的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成为“文明冲突论”了。有鉴于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特别强调要加强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在“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中亚地区和东盟地区是文化、宗教最复杂的地区,长期以来,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

^① 关于国际社会共生理论的研究请参见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金应忠《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② 例如,2015年6月6日,中国同匈牙利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随后的11月7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标准化机构共同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将在共同关注的领域,相互采用对方标准,共同推动产品标准的协调一致,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11月24日,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中国苏州举行,中国同与会各方围绕“新起点新领域新愿景”主题,共同制定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纲要强调各方在各个领域内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这些情况表明,欧亚大陆各国都认同“一带一路”是一项共赢的战略设想。

文化合作一直就是多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司法培训中心、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等，这些都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大陆的天缘政治

“一带一路”不仅要恢复古丝绸之路的和平与繁荣，而且在世界政治进入天缘政治时代以后，“一带一路”也要建设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太空。有学者将科技进步导致的太空国际政治现象称为“太空时代新的地缘政治”^[4]。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将这种现象称为“天缘政治”^[5]。“天缘政治形成和发展是地缘政治扩展与太空战略竞争态势演变的必然产物。按照现有太空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各国太空开发利用活动都是在其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的，也就是说各国需要对自身国内不同太空主体的太空活动在国际层面承担统一的主体责任”^[6]。同时，天缘政治的格局也直接受地缘政治状态的影响，当前，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呈现出合作共赢的大势，所以，“一带一路”的天缘政治格局也无疑将朝着合作共赢的趋势发展。

天缘政治始于太空竞争，例如，20世纪50年代苏美两国先后把卫星送上了太空，60年代苏联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则成为第一个在地球外星体上留下脚印的人类成员。苏美两国开启了天缘政治竞争的序幕。不过在那时，美苏之间的太空竞争内容非常单薄，当时主要是战略导弹和太空器助推技术，美苏的卫星技术发展很快，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统性的太空技术。例如，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研究全球定位系统(GPS)，但该系统直到1994年才全面建成。俄罗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格洛纳斯)始于苏联解体以后的1993年，但也是到2007年才开始运营的。而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则更晚，是1999年才公布的。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开始挤进了太空研究与开发的行列之中，中国的北斗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制的，不过也是直到2000年才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所以说，那时天缘政治时代并没有到来。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除美国、俄罗斯外，中国、日本、欧盟、印度等多个行为体相继在太空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相互之间的竞合关系，并构成了天缘政治的基础性关系。因此，“21世纪的门槛

不仅表明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更标志着世界政治迈入了天缘政治时代的门槛”^[5]。不过，天缘政治与地缘政治最大的差别在于，地缘政治是以主权国家的领土为基本边界的，尽管地缘政治是一个内涵模糊的词，但它实际上是受到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的束缚的。天缘政治则不同，基本上没有任何边界，也不受主权国家领空边界的束缚。这种情形客观上要求各国太空开发和利用必须要加强合作。而事实上，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在外太空的开发和利用就一直紧密合作。这种情形是地缘政治合作的延续，但其合作水平又高于地缘政治合作的水平。例如，中国北斗系统与欧洲伽利略系统的合作、北斗系统与俄罗斯“格洛纳斯”的合作，以及北斗系统与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合作一直都存在。

最初，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处于垄断地位，迄今为止，它仍然占据全球85%左右的导航市场。一方面，这种情形并不利于技术的发展，因为美国的长期垄断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惰性。而出于安全考虑，各大国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当然，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利益的拓展，各大国也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卫星系统，以加强本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前文述及，“一带一路”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但是，基础设施并非仅仅是指铁路、公路，还包括承载信息传输的基础设施，没有信息基础设施就没有信息的互联互通，而中国北斗导航系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选的一种信息基础设施。

中国北斗系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有技术基础，也得到了相关国家的认可。从技术基础来看，北斗系统主要覆盖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为中国、也可为周边国家服务。2015年一年中北斗导航系统发射了三个卫星，使得整个系统的卫星数量达到了20颗，其覆盖范围也由原来的东经55度到180度扩大到东经50度到180度之间的中低纬度区域，而这个范围大致在“一带一路”所覆盖的核心区域，包括西太平洋地区和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地区。到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覆盖全球。^①随着北斗导航系统在2012年底完成亚太地区组网，北斗导航系统不仅在中国国土范围内获得使用，同时周边国家也在认可的情况下会陆续采用北斗

^①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20年覆盖全球》，载 <http://www.ddh.roboo.com/>

系统。这就意味着北斗导航系统已经走出国门。2014年11月7日,联合国的国际航海标准设立机构——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正式将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纳入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之中。这意味着北斗成为继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后第三个被联合国机构认可用于航海操作的定位数据。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北斗系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相应的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北斗导航系统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和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技术上存在着互补性而非竞争性关系。美国的GPS只能定位,而不具备通讯功能。北斗的通讯功能主要是短报文通信,一次可传送多达120个汉字的信息,而且在所覆盖的范围内没有通讯盲区,在海岛和高山区域的优势尤其明显。这是北斗系统与美国、俄罗斯、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相比所体现的最大优势。如果北斗的通讯功能与定位功能结合,就可以实现对无人区等特殊环境的设备控制等。该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无通信信号的救灾终端,可以通过短报文通信功能,及时报告情况;野外或无人区的基站控制、油路仪表数据读取等应用也将成为可能。此外,北斗的通讯功能将被广泛地应用于物联网之中[5]。从中国在北斗系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得到了已经使用的国家的赞赏。虽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2012年才在亚太地区组网的,但中国卫星对外合作在此前就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早在2006年,在卫星出口方面,中国已经向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出口了通信卫星,与玻利维亚、白俄罗斯、印尼、老挝等国家签署了通信卫星出口合同,与委内瑞拉签署了首个中国遥感卫星出口合同,这些合同都在执行当中;2007年11月,中巴(巴西)空间技术合作超越双边合作范畴;2012年北斗系统海外组网以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外推广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2年9月,中国遥感卫星出口实现零的突破;2013年5月,中巴双方签署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协议;9月,中巴双方签署了《巴基斯坦国家位置服务网一期工程协议》,中国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建设由五个连续运行参考站组成的CORS网络,这是中国北斗系统首个海外CORS网(组网)官方项目。2013年8月,武汉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与研究中心和泰国科技部地理空间技术局签订共同制定总体规划的MOU备忘录。备忘录覆盖以下三个方面:(1)泰国地球空间灾害监测,评估与

预测系统;(2)中国北斗系统在泰国的应用;(3)泰国北斗卫星应用东盟产业园。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提出双方合作要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双方共同研究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地阿拉伯项目。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签署了为“丝绸之路”提供卫星通信服务的协议。同月,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发展战略高层论坛通过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北京宣言》(以下称《北京宣言》),提出亚太地区空间能力发展与合作的新愿景。^①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10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开展空间应用合作协议,与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联合推进中国遥感卫星数据和产品在东南亚区域的应用服务。这些都表明,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缘”政治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包括人才的互联互通,这既包括国内人才的流动,而且还包括国际人才流动的互联互通。但是,无论是国内人才流动还是国际人才流动都是从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这种情形是由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才竞争所致。由于这种竞争,国内不同地区的人才流动会进一步加大发展的不平衡性,国际的这种人才流动模式则会导致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性。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人才的流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是受当时的国家实力

^①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中国、泰国、巴基斯坦在1992年倡议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空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多边合作,并通过技术研发、应用、人才培养等事务在成员国之间开展互助,提高成员国空间能力,促进人类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构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愿与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起,共同构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提升亚太空间能力建设。

制约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所以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过去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所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特别快。因此,人才流动方向基本上是从落后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该地区的城市聚集的,从而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个人才高地。但是,这种状况也彰显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问题:发达地区不仅获得了中央优惠的发展政策,而且也用高收入等手段“掠夺”了落后地区的人才。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么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现象将很难改变。中西部地区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自然条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大。更大的问题是,中西部地区难以留得住本土的人才,大量的人才流向了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结果,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地区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马太效应: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马太效应,通过互联互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西进运动”。

从国际的情况来看,人才流动同样也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人才从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天然地就占据着国际竞争优势,而这种人才流动方式更强化了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除此之外,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人才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科技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既是国家吸引国际人才的原因,也是国际人才流动方式造成的结果。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凭借自己的强大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成为国际人才聚集之国,从而使美国获得了可持续性的创新动力。因此,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成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这正是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绝对主导权国家的重要根源。即使冷战结束以后不少学者认为美国衰落了,^①但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取代美国。原因就在于,美国在高等教育指数、每百人拥有的宽带用户数、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占总人口比重、每百万人从事研发的人员数、科技投入占 GDP 的比重、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发表科技论文数、每百万人居民申请专利数、最新科技利用指数、国

际科技影响力指数、超级计算机指数等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见文末“美国创新能力的基础数据分析”表)。美国能够拥有这些优势,是因为美国在人才战略上是一种竞争性的战略,它大力吸引世界各国人才。正是因为美国的人才战略是国际竞争性的人才战略,从而也就是一种竞争性的“人缘”政治。

然而,“一带一路”的“人缘”政治不是一种竞争性的人才战略,而是一种共享型的人才战略。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在地缘政治上是合作的战略,在地缘经济上是共赢的战略,为了推进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乃至天缘政治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是通过各种合作项目来推进的,而项目则是靠人才来落实的。“一带一路”的所有项目都是合作性项目,而不是竞争性项目,因而人才使用是共享的,是一种共享型的“人缘”政治。凤凰智库的研究报告提出要整合区域国别与海外利益研究的专家库,并且凤凰智库从原有 1900 多个国内专家里筛选出“一带一路”的国别专家包括东南亚 11 国的 70 位、南亚 8 国的 31 位、西亚北非 16 国的 63 位、中东欧 16 国的 61 位、中亚 5 国的 52 位、独联体 7 国的 128 位共 405 位(不含中国专家)^②。凤凰国际智库的这一数据表明,“一带一路”的人才不是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服务,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服务的。不仅研究专家是如此,而且所有的具体项目人才也是如此,因为中国提出这一战略构想之后,从政府到企业乃至各种社会组织已经广泛

^① 例如,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重蹈历史上霸权国的覆辙,已经被过度的军事扩张耗尽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502—522 页。此外,伊拉克战争之后,先是美国内部开始怀疑美国的实力是否还能支撑其霸主地位,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认为反恐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不啻是“美国鹰坠地”。这种观点跟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一贯的主张极为相似,认为美国长期发动战争,并未吸取历史上帝国过度扩张的教训,其结果必然是帝国的衰落。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3—16 页。他们是美国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代表,实际上中国国内主流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代表性的学者不少,这里不一一列举。

^② 参见黄日涵《当务之急是建设带路沿线国家人才库》,《凤凰国际智库报告·国别研究》2016 年 1 月 20 日。

参与其项目计划,尤其是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主体,项目涉及高铁、核电、信息技术、石油和天然气、有色金属、卫星导航等领域,具体项目的推进并非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事情,而是相关国家、相关企业共同的任务。因此,通过相应项目的合作来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基于人才共享的“人缘”政治理论才能实现。

结束语

任何战略的成功实施都离不开天、地、人三者的有机结合。古人所谓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从三者战略中的权重比较来说的。实际上,三者都强调“和”与“合”的重要性。因此,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让人觉得中国对美国的主导权具有挑战性,是把中国崛起置于美国的对开面。这种情形就很难使中国崛起规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秉持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地缘政治、天缘政治和人缘政治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并用以推进经济发展,并没有提供具有普遍意义和对各国都有价值的规则,因而“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计划。现有的全球公共产品仍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国所提供

的,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能够有一定的提供能力,但仍然主要还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当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创新能力,例如通过经济合作来协助落后国家减贫问题,这是中国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最大创新。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彻底突破了地缘政治、天缘政治、人缘政治的竞争,走向了地缘政治、天缘政治、人缘政治的合作,这是中国最大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 [1] 胡键.“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 (4).
- [2]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 37-41.
- [3]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54-55.
- [4] 何奇松.国际太空活动的地缘政治[J].现代国际关系, 2008 (10).
- [5] 胡键.天缘政治与北斗外交[J].社会科学, 2015 (7).
- [6] 徐能武.天缘政治学研究:内涵、范式与价值[J].社会科学, 2016 (1).

表

美国创新能力的基础数据分析

	美 国	
	2010	2012
著名科研机构指数	672.97	0.374
高等教育指数	2 208.25	0.218
每百人拥有的宽带用户数	27.618 42	-
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占总人数比重 (%)	69.25	0.821
每百万人从事研发的人员数	6 074.28	0.878
科技投入占 GDP 的比重 (%)	2.787 087	0.710
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5.72	6.48
发表科技论文数	533 615	533 615
每百万人居民申请专利数	241 977(全年总数)	855.69
最新科技利用指数	6.440 378	0.883
国际科技影响力指数	43	1.0
超级计算机指数	121 419.6	1.0

数据来源: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竞争力中心发布的相关各年数据整理

[责任编辑:高云涌,张斐男]